

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的“叫魂”

——读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田 鹏

哈佛大学中国学研究专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该书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是近年来美国汉学研究中罕见的一本“大书”。《叫魂》自1990年出版以来就受到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直到1998年才由上海三联书店组织翻译并出版，中国大陆学者得以目睹这本“大书”。作者在该书中集中解释了这样一个“悖论”：“既是太平盛世，何以妖术横行”？因此，作者通过妖术大恐慌的整个运作全过程，重点考察了中国帝国主义体制下特殊的权力运作机制，即他提出的“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以修正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倡导的君主专制权——官僚常规权的二分对立分析模式。《叫魂》一书的出版，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

一、“太平盛世”下的“妖术盛行”

《叫魂》一书是由一系列稀奇古怪、扑朔迷离的故事和案件串联起来的，而矛盾的是，这一个个稀奇古怪的事情不是在乱世下，而是在弘历皇帝（乾隆皇帝）治下的“太平盛世”发生，这一年看起来颇为矛盾的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看似庞大、固若金汤的大清帝国，实则危在旦夕、不攻自破，而作者孔飞力正想描述这一矛盾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种种政治、社会及文化的意涵。

“叫魂”妖术案发在1768年，即弘历（清帝乾隆）三十三年。这种妖术恐慌突然在当时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浙江德清县）发生，一个小小的“剪辮案”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沿着运河和长江一路西行北上，迅速席卷了满清帝国的大江南北，短短的时间内就是使整个大清帝国笼罩在“叫魂”妖术的莫名恐惧之中，世间百态在大恐慌到来之际展现得淋漓尽致：小到贩夫走卒、乡愚村妇此等民间布衣，大到身居庙堂的各级官僚，最终使得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弘历皇帝寝食难安，决定驱散“叫魂”带来的这股妖风邪气，在满清帝国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大清剿，但结果，却落到一个庸人自扰、始乱终弃的丑恶闹剧，因为大清剿中没有抓到一个作案的“妖人”，没有一件妖术案件能够坐实，有的只是庸人自扰，屈打成招，弘历皇帝不得不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孔飞力所讲的故的确精彩绝伦，通过详实丰富的档案资料，将整个妖术大恐慌的发生全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在这些看似稀奇古怪、扑朔迷离的种种“叫魂”叙述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孔飞力分别站在三个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三种不同版本的“叫魂”故事。

（一）“权力的幻觉”：普通民众眼中的“叫魂”

这个版本是从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等基层普通民众的角度来叙述的。

作者孔飞力在《叫魂》一开篇就讲述了发生在浙江德清县的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剪辫案”，详细叙述了整个“叫魂”妖术大恐慌的始作俑者——“德清县的石匠”。¹作者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所要呈现的是一种“受困扰社会” (impacted society)，即“社会上到处呈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²他认为这种社会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所描述的二十世纪美国的“零和社会” (the zero-sum society)十分相似：在这两种社会我们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而与美国富裕的工业社会下风险分担的过程不同的是，清帝国统治下的风险分摊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中进行的，是一个更为激烈和残酷的过程。因此，作者孔飞力认为，在弘历皇帝的统治下的大清帝国看似“太平盛世”，实则危机四伏，统治基础岌岌可危：人口急剧增加、社会高度拥挤、社会两极分化悬殊、各级官僚贪污腐化等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正在侵蚀着满清帝国的“合法性”；但是，“人们对正在侵蚀普通大众生存机会的种种实际力量却几乎完全不了解；”³最终使得妖魔鬼怪、阎罗无常这种在民间司空见惯的现象，演化成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因此，作者孔飞力认为，在这种“受困扰社会”下的普通大众对权力也只能是一种幻觉，仅仅存在于大众的幻觉之中，因为绝大多数的普通大众没有机会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他们被剥夺了获得平等社会流动的机会，也就不能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人生价值进而去竞争社会资源。所以，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的非常机会去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⁴也只有在这种非常境况下，这种“受困扰社会”才会给无权无势者的社会基层民众带来突然的机会，从而使他们改善自己的境遇或打击自己的敌人，所以作者孔飞力认

¹ 故事详见 [美] 孔飞力 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 [M] 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2:1—9.

² [美] 孔飞力 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 [M] 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2:284.

³ [美] 孔飞力 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 [M] 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2:287.

⁴ [美] 孔飞力 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 [M] 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2:287.

为，冤冤相报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⁵

（二）“谨慎的喝彩”：知识阶层（各级官僚）眼中的“叫魂”

《叫魂》中关于妖术恐慌叙述的第二版本则来自于各级官僚，他们是大清帝国政治体制运作过程中的主要环节，也是一个饱读诗书、通晓五经的知识阶层，因此，他们是不会那么轻易相信“叫魂”妖术的，再则，这些官僚士大夫们衣食无忧，无法体会到这种冤冤相报的“受困扰社会”底层民众生活之艰辛和无奈，对谣言产生的歇斯底里更不会有真实感受和切身体会；但在大清帝国中央集权式的社会权力分配逻辑下，各级官僚更多时候担心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即能否保住“乌纱帽”，这就要求他们维护辖区内的社会稳定，防止出现大范围的民众骚乱，尤其是针对大清帝国政权的各种叛乱，因为他们受封于弘历皇帝，并肩负着“守土之责”；因此，即使他们不相信“叫魂”妖术真的存在，也不得不担心其治下的民众因为妖术恐慌而威胁到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一言以蔽之，他们最终担心的是因妖术恐慌而导致的地方失序，影响到他们的政治仕途，甚至丢掉乌纱帽，招致杀身之祸。

但我们在《叫魂》的一系列叙述中看到了另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尽管各级官员的职位与处境大相径庭，品德操守参差不齐，但他们在面对妖术恐慌时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息事宁人，安抚民间恐慌，制止谣言蔓延，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恶棍，但没有一级官僚会将这种“剪辮案”当作叛乱谋反上报朝廷。因此，作者孔飞力认为，与其说各级官僚在“照章办事”，不如说他们是在按照大清帝国的权力分配逻辑下最大化自身的政治利益。但这种“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的官场陋习是弘历皇帝清剿异己道路上不得不面对的最大障碍：“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⁶

（三）“真实与幻影”：专制君主弘历皇帝眼中的“叫魂”

无可争议，弘历皇帝是大清帝国君主专制的最高统治者，是帝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人格化体现，孔飞力认为，弘历皇帝并非昏君，他生逢其时，继承了由康熙、雍正两朝奠定的“太平盛世”，为他的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弘历皇帝本人好高骛远，好大喜功，在平常人看来更是喜怒无常：一方视自己为千古一帝、名垂青史，另一方面，这种心态也加深了他的

⁵ [美] 孔飞力 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 [M] 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2:287—288.

⁶ [美] 孔飞力 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 [M] 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2:290.

猜疑心和内心深处的危机感，因此，与其说弘历皇帝治下的“太平盛世”，倒不如说是他本的人好大喜功和猜忌心所致，并急于展现他关于满清统治的一种“合法性声明”，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他的统治之下有如此之多“文字狱”的重要原因。因此，究竟弘历皇帝如何看待笼罩在大清帝国的妖术大恐慌？又是何种原因使得他不得不下定决心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彻底大清剿？作者孔飞力认为，弘历皇帝发动的清剿行为有其特殊的运作逻辑——“弘历皇帝的忧惧亦真亦幻”。其中，真实的部分在于他难以打破官僚体制的自我满足、官官相卫的丑陋积习，因此，他要维护和巩固自身的既得利益，就必须不断地诉诸于专制和无常的权力，因此，提出政治罪指控则这种权力运作的最佳方式和最佳时机。而幻影的部分则在于，他对于超越其所能预见与控制的官僚势力心存畏惧和惶恐。孔飞力认为，弘历皇帝的惶恐来自两个方面的危机：叛乱和汉化。⁷因此，弘历皇帝时而表现出对妖术之荒诞的不屑一顾，大骂妖术是一种荒诞不经的迷信，但时而则表现出对妖术的“浓厚兴趣”。因此，作者认为，与其问弘历皇帝是否相信“叫魂”妖术是否存在，毋宁问，对他来说，这些术士的妖术比之汉文化的蛊惑是否更不可信？因为，对皇帝本人来说，善于“叫魂”的术士们窃取的是大众们的灵魂，而“腐败”的汉文化窃取的则是满洲的“品德”，哪一种威胁对他更具威胁性、更显真实呢？⁸

无论弘历皇帝究竟出于何种原因，他终究还是决定对祸及大江南北的“叫魂”式歇斯底里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清剿，无论这种自上而下的浩大工程结果如何，首先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高度汉化的官僚阶层，因此，如何运作“叫魂”危机中的专制权力，打破汉族官僚们对他的束缚，才是他首先要“摆平”的难题。那么，弘历皇帝在面对高度汉化的各级官僚阶层时，他个人代表的满清帝国专制权力又是如何与被这些汉族官僚们牢牢控制的常规权力相互博弈的呢？

二、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叫魂”背后的权力博弈

在《叫魂》中，作者孔飞力为读者展现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个讲述的是流传于民间普通百姓的“叫魂”式歇斯底里，另一个是大清皇帝如何逐渐意识到妖术对其统治的合法性之侵蚀，最终决定发动全国性的大清剿，第三个版本讲述的是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僚面对妖术大恐慌产生的两难处境：既要令上一级满意，又不能无视其辖区内基层民众的诉求，但

⁷ [美] 孔飞力 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 [M] 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2:280.

⁸ [美] 孔飞力 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 [M] 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2:280—281.

由于官场陋习的低效率，他们并未使任何一方满足。这些故事相互重叠，“几个文本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孔飞力认为，这些故事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更令人难以解读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包括妖术恐慌在内的种种地方性事件是如何演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

⁹作者孔飞力在《叫魂》的最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弘历皇帝治下的大清帝国之政治运作机制是一种“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而这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的运行离不开他所谓的“政治罪”。¹⁰作者孔飞力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常规权力与专制权力之间的关系。¹¹

首先，孔飞力认为，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与叛乱，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造反，而妖术在大清帝国政治制度中所扮演的正是这种政治罪的角色。但政治罪危及到的是王朝的统治基础，所以它与各级官僚的贪污腐化等问题的性质不同，后者所影响的只不过是政治制度的运作效率而已，不会直接威胁到帝国统治的合法性。既然“叫魂”在帝国的政治制度中扮演着一种政治罪的角色，那么社会各阶层对这种威胁到帝国制度基础的政治罪又是作何反应的呢？作者孔飞力认为，要客观公正地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将政治罪置于它所谓的“官僚君主制”中去考察。

其次，何谓“官僚君主制”？作者孔飞力首先质疑了关于权力研究的一种经典模式：君主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权力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即两者呈现一种零和博弈；同时，自马克斯韦伯以来，人们的分析一直相信，随着现代理性的逐步发展，以官僚制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常规权力必将取代人格化的专制权力。但孔飞力在考察整个“叫魂”引发的妖术大恐慌之始末后认为，在帝国特殊的政治制度下，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并未遵循上述扞格不入、此消彼长的互动模式，而是呈现出一种并行不悖、甚至和平相处的局面。因此，他认为韦伯关于两种权力关系的分析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之互动的问题。但在中国的官僚制度中，皇帝也并非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也并非一个权力无所不及的人，因为皇帝在面对庞大的官僚阶层时也常常力不从心，甚至束手无策。因此，孔飞力认为，韦伯所谓的“官僚制”(bureaucracy)并不适用于中国特殊制度，中国的制度更多的时候表现出的是他所谓的“父系家长和世袭统治”。¹²那么，既然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

⁹ [美] 孔飞力 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 [M] 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2:232.

¹⁰ [美] 孔飞力 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 [M] 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2:272.

¹¹ [美] 孔飞力 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 [M] 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2:233.

¹² [美] 孔飞力 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 [M] 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2:233—234.

下并非零和博弈，这对矛盾的组合体——“官僚君主制”又是如何得以可能的呢？进一步而言，官僚制给君主留下了多大的自由空间？同时，君主又是通过何种手段来控制官僚阶层的呢？

最后，“官僚君主制”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但在孔飞力看来君主通过某些特殊手段和非常措施以避免他被官僚制所束缚，即变为官僚机制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齿轮”。这些手段和措施包括：效率的监督和指导，尤其是对各级地方官员绩效的考核和三年一次的绩效大考核，同时辅之以各种监察机构，如御史台等以及制度化了的考评标准和官员弹劾制度。正如克罗齐所指出的，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常常利用两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最佳的策略是找到两种武器的最佳配合方式，即通过规则的扩展限制他人权力的同时，通过例外来削弱规则对他自己的束缚。而面对来自皇帝专制权力的种种束缚和限制，各级官僚阶层又是如何规避专制权力的呢？他们通过各种官场庇护制度、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等各种手段以避免专制权力的规制，即通过各种“常规化”构建各种刚性制度来保护自己，最小化专制权力带来的负面效应。

三、小结：“叫魂”的当今启示

孔飞力的《叫魂》虽已问世多年，“叫魂”引发的全国性大恐慌也早已为后人所淡忘，但这种“叫魂”式的歇斯底里引发的社会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不断反思自身发展过程，才能最小化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最大化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那么，1768年发生在弘历皇帝治下的“叫魂”大恐慌能给当今转型期的中国带来哪些深刻的启示呢？笔者认为，虽然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早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但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今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如何借鉴和汲取“叫魂”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今天我们重读《叫魂》所不得不深刻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是否面临着《叫魂》中孔飞力所谓的“受困扰社会”之困境呢？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从物质贫乏的计划经济时代成功过渡到物质丰富的市场经济时代，这个急速的社会变迁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就是城市人口比重急剧上升，即城市化率快速上升，而这种高度城市化进程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如城市人口密度过大，城市人口生活压力倍增，城市化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风险分摊不均等问题，类似于孔飞力所谓的“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 这种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社会问题不能依靠自身的发展来解决, 而只能通过合理的风险分摊机制来化解社会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冤冤相报”。所以笔者认为,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上世纪提出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 从风险角度而言, 和谐社会建设过程就不仅仅是一个发展成果如何重新分配和共同分享的过程, 而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和谐性”(harmony)该如何体现? 即如何公平合理地分摊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风险, 包括执政党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腐败问题。这是中国社会能否成功转型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之一。

其次, 弘历皇帝及清帝国政治体制在面对“叫魂”式歇斯底里时的处理措施和手段能否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一些启示呢? 在《叫魂》中, 作者孔飞力考察了大恐慌发生的始末后认为, 中国政治体制中并不存在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理性化对专制权逐渐祛除的过程, 也不可能退回到专制权力代替官僚常规权力行使一切的集权制时代, 即不存在专制集权与官僚分权相互冲突的权力运作逻辑, 至少这种由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总结出来的权力分配逻辑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 孔飞力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下总结出了一对特殊的矛盾结合体——“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 以分析“太平盛世何以妖术横行”这一矛盾社会现象。其中, 孔飞力特别强调了作为专制权力的人格化代表——弘历皇帝(即乾隆皇帝)如何利用“叫魂”这一特殊的“政治罪”对各级官僚阶层牢牢掌控的常规权力进行干涉, 并不断建构清帝国的合法性基础, 以化解由汉化带来的“合法性危机”, 在《叫魂》的结论部分, 作者指出, “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情况下, 统治者可以利用操纵民心的恐惧, 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¹³因此,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我们如何看待执政党与政府以及公民社会(尽管中国到底有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还存在很大的分歧)之间的关系呢? 中国权力分配以及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 又该如何合理建构一套权力和利益的既得者与权力受损者之间的风险分担机制呢?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关系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更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未来。

最后, 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权力运作过程中仍然会时常出现孔飞力在“叫魂”叙述过程中所看到的那些“官场陋习”: 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官官相卫等等, 这些现象为何还会在几百年后的今天活跃? 它们的存在显然已超越历史和阶级的限制, 成为附着于中国权力运作体制中的“顽疾”, 甚至是“毒瘤”, 正如孔飞力所说, 虽然它们不会像“政治罪”那样危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但会极大的影响权力的运作效率, 直接导致权力运作成本增加, 久而

¹³ [美] 孔飞力 著 《叫魂: 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 [M] 上海: 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 2012:291.

久之也会间接地引发“合法行危机”。因此，但官僚阶层的这些“毒瘤”和“顽疾”很难仅仅通过自上而下的特殊手段加以彻底根治，也不可能单凭个别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崇高威严而有所缓解，因此，如何有效克服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官场陋习”也是横亘在中国社会能否成功转型的又一难题。

参考文献：

1. [美] 孔飞力 著 《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 [M] 上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12.
2.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 编著 《中国政府改革线路图》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文章来源： 作者投稿